

周策縱・唐德剛・李孝
悌……等十餘位學者
精研力作

胡適與 近代中國



時報文教基金會叢書

3

胡適與近代中國

ISBN 957-13-0287-2

時報文教基金會叢書③

胡適與近代中國

著者——周策縱、唐德剛、李孝悌……等十餘位學者精研力作

發行人——王作榮

策劃——彭垂銘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2911和平西路三段240號四F

發行專線——(0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2)3024094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01038540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封面設計——凌傑

校對——陳桂枝

排版——文盛電腦排版公司

製版——成宏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嘉雨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定價——新台幣二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13-0287-2

胡適在今天的中國

——序《胡適與近代中國》

余英時

「國際胡適學會」在李又寧教授的策劃和推動下召開這次「胡適與近代中國」的學術研討會，兼以紀念胡適之先生一百虛歲的生日，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舉動。國立政治大學張京育校長慷慨支持，使會議終能依照原訂計畫實現，我們都應該向他表示很深的感謝。時報文教基金會大力協助促成，我們也深表謝意。此外就我個人所知，張朋園先生和陳宏正先生也都會為這次會議熱心奔走；沒有他們兩位而努力，這個會議也是開不成的。我個人十分慚愧，因為早已答應了別的約會，竟不能前來參加這一盛會，用胡先生生前愛說的比喻，我是這次會議的「逃兵」。但是我這個「逃兵」並不敢忘記我的朋友們此時在台北的辛苦和貢獻。所以我用這篇簡短的獻詞向大家致最深的敬意。

「胡適與近代中國」是一個很廣闊的題目，但是卻是很合適，很必要的，因為胡適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本來便是非常廣闊的。這裡的「近代」一詞在內容上是有伸縮性的，它可以一直延長到今天。在今天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心中，胡適並不完全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他的思想中的某些部分似乎又全新閃爍著生命的光芒。我最近有機會聽到好幾位大陸青年知識分子的議論，他們

都不約而同地對胡適所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表現出無限的嚮往。儘管他們並沒有讀過《胡適文存》。我又剛剛收到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的一封邀請書，明年將舉辦第二次關於戴震的學術會議，主題是「戴學與胡適」。信上同時說明：這次會議是為了紀念胡適的「百年誕辰」。安徽的後輩對他們的「鄉賢」還是十分景仰的。

這些跡象顯示出胡適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又開始滋長了。大陸知識分子對胡適的新興趣和海外（包括台灣）形成了相當強烈的對照。以台灣來說，提起胡適，許多人也許都會有一種遙遠和模糊的感覺——胡適已遙遠和模糊到引不起開會紀念的興趣。但這是最近幾年的台灣的新現象。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台灣知識分子對胡適的興趣也曾經很熱烈過，其熱烈的程度並不減於今天的大陸。所以今天台灣知識分子對胡適的冷淡恰好說明台灣的政治現實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胡適當年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所提倡的言論自由，反對黨的自由在今天的台灣已變成政治現實的一部分了。相反的，大陸知識分子對胡適的新熱潮也正好使我們可以窺測海峽對面的政治動向。

大約在十年以前，大陸一位「學術領導人」到耶魯大學來訪問——他今天還在大陸的「社會科學界」居於「領導」的地位，我們在席間談起了胡適，他說：胡適應該一分为二，他在學術上還有進步意義，但在政治上則是反動的。這當然代表大陸官方的觀點。我說：我們海外中國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適在學術上早已被拋在後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觀念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是有意義的。這位「領導人」總算是有雅量的。我們並沒有弄到「不歡而散」。事實上，即使以學術而言，胡適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不但沒有落後，而且還在發生啟蒙的作用，我的話是站在海外的立場上說

的，對於大陸並不適用。

那麼胡適對於台灣而言是不是在學術和政治兩方面都已完全過時了呢？在學術上，不少人確已在胡適所開闢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了，而且除了他那一條路外，還有別的新路可走。年輕一代的學人大概不必再向他的著作中去汲取靈感了。換句話說，他的著作的絕大部分只有歷史的意義了。但是他所提倡的「勤、謹、和、緩」的治學態度則依然沒有過時，甚至還使人有與時俱新之感。在政治上，台灣今天也不需要再藉著胡適的招牌來爭取言論自由、組黨自由了。但是他晚年所特別強調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似乎對於今天的台灣還有嶄新的啟示。在台灣民生化的現階段上「容忍」是一個最具關鍵性的觀念，比三十年前更為迫切了。

「胡適與近代中國」研討會在今天的台北舉行可以說是適時適地的。我遙祝會議的成功，並提出以上的粗淺的看法，請大家切實指教。

目

錄

序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

同途殊歸兩巨人

——胡適與魯迅

胡適與國民黨

胡適與蔣介石

胡適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運動

一代宗師的塑造

——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

余英時

李孝悌

陳漱渝

蔣永敬

陳儀深

姜義華

沈松僑

1
3
1

1
1 9
3 7

6
7

4
3

1

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

胡適的科學主義

胡適在「歧路」上

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胡適論自由

歷史、時代與人物

——有關胡適研究的若干斷想

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

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

周質平

林正弘

李達嘉

呂實強

林載爵

李又寧

周策縱

唐德剛

1
6
9

1
9
7

2
1
3

2
5
3

2
7
5

3
0
3

3
1
9

3
3
5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李孝悌

——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

一、引言

民國十二年，以評論文章見長的甲寅派領袖章士釗對新文化運動加以抨擊，其著眼點主要是對白話文的風行痛下「針砭」。對章氏來說，白話文運動的迅速進展顯然到了讓人驚心的地步，所謂「今之賢豪長者，圖開文運，披沙揀金，百無所擇，而惟白話文學是揭。如飲狂泉，舉國若一，胥是道也。」^①而造成這種舉國若狂的現象的就是胡適。自從胡適祭起文學革命的旗幟後，跟隨的人就「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②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牠嗎呢吧咧之文變。」^③從章氏生動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當時人對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的看法，以及白話文風捲殘雲的態勢。連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胡適在這場「文變」中扮演的角色，擁護白話文運動的人就不必說了。廖仲愷甚至對胡適說：「我輩對於先生鼓吹白話文學，於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傳於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

德，較孔孟大且十倍。」^③即使批判胡適不遺餘力的中共學界在這幾年的翻案風下，也開始比較客觀的全面重估其的思想，對他在白話文運動中的貢獻加以肯定。^④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白話文雖然因為胡適這位知音而由附庸蔚為大國，從此成為中國人抒情論理的主要工具，卻並不意味白話文運動一直到胡適的提倡才首開其端。就和五四運動的其他許多面相一樣，我們必須在清末的歷史中找尋其端源。Benjamin Schwartz教授曾經用一個很巧妙的比喻說明這個觀點，他認為五四不是平原上突起的高峰，而是高山帶上比較高的山脈。^⑤這個比喻用來解釋白話文的發展同樣恰當。事實上，胡適之前早已有人提倡白話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說法，胡適本人就多次提到清末白話文的發展。^⑥問題是過去有關清末白話文的討論不僅低估或根本忽視了這個時期白話作品的數量，也不會對這項發展的意義作過適當的評斷。正因為我們對清末白話文運動的意義沒有確切的了解，我們對胡適在這個運動中的貢獻的真正性質，也勢必無法完全的掌握。本文的目的就在探討清末白話發展的詳情，分析其特質，然後再在這個歷史的脈絡下重新估量胡適在中國近代白話文運動中的地位與意義。

二、清末白話文的發展

李澤厚曾經用「啟蒙」與「救亡」兩個主題來解釋五四運動及其後中國思想史的發展。^⑦事實上，這兩個主題不僅可用來解釋五四，也同樣可以用來分析清末的許多發展。一八九五年，嚴復發表了著名的「原強」一文，利用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社會有機體」的理論，重新審視中

國的問題，提出了「鼓民力」、「新民德」、「開民智」的主張。^⑧其中「開民智」的主張成為此後知識分子的新論域，「開民智」三個字也成為清末十年最流行的口頭禪，其普遍的程度絕不下於五四時代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這種為了救亡而強調啟蒙的重要性的思潮，在義和團之亂後達到最高潮，一般「有識之士」或所謂「志士」有感於「無知愚民」幾乎招致亡國的慘劇，紛紛設法從事各種開民智的工作。他們辦閱報社、宣講所；積極提倡演說；試驗、推展各種新的字母、簡字；為貧苦不識字的人辦半日、簡字學堂；發起戲曲改良運動。凡此種種，都清楚的指出在清末的十年，在救亡的強烈危機意識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如火如茶的展開一項空前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⑨就在這樣的思潮和運動下，清末的白話文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一) 清末的白話報刊

討論清末的白話文運動，第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白話報刊的蓬勃發展。根據一項統計，至少在一八九七年就已出現了兩份白話報，從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一年共出了一一一種白話報。^⑩而北京一地在辛亥革命後一年內就至少出了十六種白話報。^⑪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又出了二十七種。^⑫事實上，這份統計資料還不完全，我就在一些報紙的記載和廣告中另外輯出二十份出版於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一年間的白話報刊。^⑬我想如果我們在各地的報紙資料中繼續梳爬，一定還可以發現更多在五卅之前印行的白話報刊。

當然，這些報紙的壽命多半都不長，很多出了幾期後就因為經費不足而關門大吉。黃培林在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二日和八月十五日在北京分別出版醒群白話報和醒群畫報，但很快就停刊，^⑭

可以說是相當典型的例子。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長年附刊白話的大報和一些有影響力的純白話報。日報中附設白話一門的以天津大公報首開其例，自一九〇二年創刊以後就經常性的附有白話論說一欄。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起每日定期出版白話附張，稱為「敵帚千金」，免費隨報分送，也另外單張出售。¹⁵不久之後，這些白話附張又以同樣的名字結集出版，到一九〇六年三月就已經出了十本。¹⁶到一九〇八年初出到三十冊。¹⁷這個時候，大公報認為風氣已開，北方的白話報紙日漸增多，不需要在「踵事增華」「每日曉曉陳言」，¹⁸所以停掉每天的白話附張，改為不定期的刊登白話專欄。剛開始時，有時七、八天甚至十幾天才出一次，但不久後，又恢復經常性的出刊。

自從大公報附設官話一門後，「因為其說理平淺，最易開下等人之知識，故各報從而效之者日眾」。¹⁹這種為了開啟下層社會人民的智識而使用白話的作法，很顯然的已經成為一代風潮。以北方另一份主要的日報順天時報為例，也從一九〇五年的六月二十九日起出版白話附張，從七月十四日起開始經常性的見報，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都有白話論說或記事。在南方，一九〇〇年創刊的革命黨的第一份機關報中國日報也有白話專欄，更值得注意的是用白話或廣東方言寫的各種戲曲，如粵謳、龍舟歌、南音、班本、雜曲等。這種刊載戲曲文詞的作法明顯的反映出清末改良戲曲以開通民智的思潮，只不過革命黨進一步用來宣傳革命。革命黨的另一個機關報民立報（創刊於一九一〇），也闢有雜錄部，每天刊載白話小說故事。民立報在清末的影響相當大，巔峰時期的銷售量高達兩萬份，²⁰毛澤東讀的第一份報紙就是民立報，讀後還激動不已。²¹

就純白話報而言，影響最大的首推京話日報。這份報紙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創刊於北京，一九

○六年九月因創辦人繫獄而被迫停刊。創辦人彭仲翼出身官宦世家，自己也作過小官，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期間，他一度衣食無著，「被迫流落在社會底層」，對下層社會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²²庚子以後，他開始辦報。首先在兒女親家梁濟的資助下，於一九〇二年出版了一份以童蒙為對象的啟蒙畫報，以白話配合圖片。根據梁漱溟的記載，梁濟之所以資助彭仲翼辦報，是因為「經拳匪之禍，公深痛國人之愚昧無知，決然以開民智為急」。²³這段典型的記述很明確的指出拳亂與清末開民智運動的關係。彭為了達到開民智的目的，在一九〇四年進一步辦京話日報。這份報紙出版後，大受歡迎，不僅流佈北方各省，而且東到奉黑，西及陝甘。「凡言維新愛國者莫不響應傳播，而都下商家百姓於京話日報則尤人手一紙，家有其書，雖婦孺無不知有彭先生」。²⁴銷售量最高的時候達到一萬多份，成為北京第一個銷售量超過一萬份的報紙，也是當時北京銷路最大，影響最廣，聲譽最隆的報紙。²⁵大公報發行人英斂之對該報也讚譽有加，說「北京報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話日報為第一。」²⁶一九〇六年，該報因得罪當道停刊後，到一九一〇年為止，北京出的白話報至少有十幾種。這些報紙不論是在篇幅、格式或秩序上，全都模仿京話日報，「不敢稍有更張」，²⁷可以想見京話日報的魅力和影響力。

除了京話日報外，這裡還要特別提到安徽俗話報和競業旬報。安徽俗話報發行於一九〇四年，是半月刊，共出了二十二期，到一九〇五年停刊。²⁸這種維持一兩年就停刊的情形和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蘇州白話報、寧波白話報、紹興白話報等當時通行的白話小報差不多。²⁹對我們來說，這份報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主編是和胡適一起搞文學革命的陳獨秀。陳獨秀不僅是該報的主編，同時也是主要的撰稿人。³⁰一九〇四年八月第十一期中，陳以三愛的筆名發表「論戲曲」

一文，認為「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大教師」，³¹把戲曲、演員的地位推上史無前例的高峰；此外，他還在文章中提出戲曲的興革之道，是清末戲曲改良運動中的重要文獻。事實上，俗話報中絕大多數的論說都是陳以三愛的筆名發表，陳在五卅時期的思想，有一部分在此已可窺見端倪，這點下文還要繼續討論。

競業旬報對我們之所以重要，則是因為胡適在上面發表了不少文章。這份報紙於一九〇六年十月在上海創刊，以後陸續續續的發行，直到一九〇九年六月出到第四十一期為止。³²胡適在第一期就以「期自勝生」的筆名，發表了一篇通俗的「地理學」，這個時候他還不滿十五歲。後來胡適對這篇文章有所評述，認為「這段文字已充分表現出我的文章的長處和短處了。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³³從第二十四期開始，胡適負起旬報的編輯工作，一直到第三十八期。這個時期他寫了不少文章，有時候全期的文字，從論說到時間，差不多都是他做的。³⁴他日後的一些思想主張，也同樣可以在這些文字中找到根源。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照胡適自己的說法：「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³⁵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³⁶這一年多的訓練對胡適、對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到底有什麼意義，在下文中會詳加分析，此處暫時不論。

上面曾經提到清末白話文和白話報，是在對下層社會進行啟蒙以救危亡的思潮下發展出來的，這裡打算對白話報理念和實際上的閱讀者作進一步的探討。在理念層次上，白話報的對象以下層社會為主體，是毫無疑問的。上舉大公報官話一門「最易開下等人之知識」是一顯例，順天

時報在一九〇五年添設白話欄，目的也在「開發下等社會」。³⁶參與編撰一九〇一年出版的杭州白話報，自號「白話道人」的林獬（又名少泉，後改名白水），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創辦中國白話報。在發刊辭裡，他激切的說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麼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那十幾歲小孩子阿哥、姑娘們。」問題是這些希望所寄的人既沒有錢讀書，又看不懂「那種奇離古怪的文章，奇離古怪的字眼。」林和朋友商量之後，決定為了這些人辦白話報。³⁷一九〇五年在北京出版的工藝白話選報，也同樣立意為下流社會說法。³⁸此外，前述京話日報停刊之後，在北京出現的十幾種仿京話日報的白話報，根據記載，目的也在開通下等社會。³⁹又如廣東順德一個何某人，也在一九〇四年招集股本，打算辦一份粵聲報，用俗話戲曲來開發下流社會。⁴⁰而在一篇論說國語統一方法的文章中，一位作者提到當時的志士，「皆以中國文字太深，汲汲謀編輯白話書報以開通下流社會」，⁴¹可以看出當時的風向所趨。

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下流社會」或「下等社會」並不一定是識字的人，他們很可能是粗通文字的「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十幾歲的小孩子、姑娘們或林琴南說的「都下引車賣漿之徒」。⁴²一篇在一九〇二年發表，講述開民智之法的論說裡，就主張多設白話報館，「俾粗識字者皆得從此而知政要，庶不致再如睡夢矣。」⁴³北京志士所辦的京津白話報，就是為了便利粗識文字的人。⁴⁴安徽俗話報在發刊辭裡對這一點說得更清楚：「現在各種日報旬報，雖然出得不少，卻都是深文奧意，滿紙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沒有多讀書的人，那裡能夠看得懂呢？……所以各省做好事的人，可憐他們同鄉不能夠多多識字讀書的，難以學點學問，通些時事，就做出俗話報，給他們的同鄉親戚朋友看看。」⁴⁵大公報在二千號的紀念徵文中，有一個題

目的是「論推行強迫教育之法」其中一篇得獎之作就主張多設白話報社，將國家政治要聞，地方的疾苦利弊，工藝商業之發明以及社會學問的進步，編為白話列入報紙，以使粗識文字的人深知世界狀況，並增長其知識。⁴⁶

當時的人所謂的「下流社會」或「下等社會」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並沒有十分嚴格的界定，不過從上面舉的例子，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他們包括那些人。基本上，這個階層的人當然包括絕大多數不識字的人，⁴⁷和那些粗通文字的人。而白話報所針對的下流社會，大體上指的還是粗通文字的人。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個階層的人數量相當可觀，亟待開發也比較容易用白話開發；一方面也是因為白話再容易，對不識字的人來說，還是起不了什麼作用。關於前者，近人的一項研究，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的了解。根據Rawski的估計，在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人粗通文字（Functional literacy或basic literacy）的，男性大約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女性則約當百分之二到十。⁴⁸至於後者，當時多數從事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對各種媒體的對象都有相當清楚的了解。他們對文字的局限深有所知，所以提倡戲曲：重視演說、宣講；試行字母、簡字；創設簡字學堂、字母報紙，針對的都是不識字的人。

至於白話對不識字者的作用，則主要是透過講報而來。例如一九〇五年，北京一個名叫卜廣海的醫師就把東四牌樓一帶一家說書用的茶樓，改為講報處，逐日講說京話日報。⁴⁹過不了幾天，就有人起而效尤，講的也是京話日報。⁵⁰一九〇〇年代，各大城市流行設立閱報處，以廣開民智。但當時就有人表示，閱報處對認得字而無餘款買報者有益，對不識字的人卻沒有功用，所以主張多設講報處，擇錄一些白話報，講給工藝人聽，再由這些人在喝茶閒聊時傳說給其他的人。⁵¹這

種由閱報社附設宣講所或講報處的情形在當時非常普遍，講的內容不一定只限於白話報，但白話報無疑的是重要的材料。根據報導，北京的進化閱報社每天晚上講報章時事，並配合自製的電影（應該是幻燈片之類的設施），痛論高麗和印度亡國的情形，聽者日以千百計。⁵¹這個例子中，聽講的人數也許高於一般的宣講處所，但講報的作法卻是相當典型的。另外在天津河東一帶，一個叫做杜學義的窮教書匠在一所有英學館教書，為了訂閱報紙，不惜典當自己的衣物。因為有感到講報的好處，一天突然心血來潮，買了一個玻璃燈，在學館門外開起講報處來。講的主要就是白話報和敝帚千金等。剛開始，聽的人只有十幾個，都來自附近，不到十天，聽眾就增加到四、五十人，還有遠道的。杜氏照顧不來，特別找了四、五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幫忙。⁵²這個具體而微的故事，不但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當時開民智的風潮，怎麼樣影響到一般沒沒無聞的有志之士。也有助於說明白話報的閱讀對象和傳達到社會底層的方式。大公報一九〇五年上半年，京津一帶開了許多閱報處及講報者。⁵³這些講報者講的不一定都是白話報，但白話報包括在講材中應該是不用懷疑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寫作的白話，很多不僅是用來看的，也是用來說的，像「今日天氣不早了，改天再談吧！」「你們大家看看，我說這段白話是不是呢？」⁵⁴一類的表現法，很明顯的還有說書的意味在裡面。經常以竹園道人為筆名，在大公報上寫白話的丁國瑞（子良），在「竹園勸善白話並序」一文的標題下，就自加注解說「宜講與苦人及游手聽」。⁵⁵另外一個原因是宣講白話報在當時已經是許多人共同的看法。在一篇題為「論小說有益於社會」的文言論說中，作者歸結中國問題之解決，必自開民智始，而「欲開普通之民智，必自設宣講所，演白話報始。」⁵⁶有鑒於報紙